

论入华粟特人流向的完整线索及最终归宿 ——基于粟特人“回鹘化”所作的考察

邵明杰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安史之乱后,中原汉人产生了排斥胡人的社会风潮,粟特人用改变姓氏、郡望等方法极力抹掉自己的胡人特征,出现了“汉化”现象。与此同时,由于丝绸之路为吐蕃所阻,众多入华粟特人转而以摩尼教徒的身份进入回鹘汗国,并籍草原丝绸之路开展东西方贸易,开始了“回鹘化”的进程。9世纪中叶及11世纪中叶回鹘汗国及甘州回鹘的“汉化”过程中,也裹杂了众多“回鹘化”了的粟特人。而对于最终融于维吾尔族的粟特人而言,“回鹘化”也是其重要阶段。

关键词 粟特人;回鹘化;回鹘汗国;汉化;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 K24 C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10)01-0116-09

The Integrated Clue and Final Destination of Flow Direction Arrived in China Sogdian ——The Study of Sogdian into Uighur

SHAO Ming-jie

Abstract: An Lushan-Shi Siming Rebellion after, the Hans start reject the Hunni. Sogdian changed their surname and birthplace so that they can get rid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rbarian, appeared Chinese of phenomenon. At the same time, Silk Road was impassable. A great number of Sogdians entered Uighur Khanate in their character as the manichean, and start to trad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on the Steppe Silk Road. They start the process of fitting into Uighurs. The mid-9th century to the mid-11th century, in the Uighur Khanate and Ganzhou-uighur (甘州回鹘) of chinesization process, that contains a great number of Sogdians. For the Sogdians flow into Uighur eventually, the process into Uighur is a very important period.

Key word: Sogdian; Into Uighur; The Uighur Khanate; Chinese; National amalgamation

粟特人又称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等,属伊朗人种,操东伊朗语,使用粟特文。粟特人发源于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大部、哈萨克斯坦南部、塔吉克斯坦西部及吉尔吉斯斯坦西南部地区)。在粟特人建立的多个城邦国家中,以撒马尔罕(Samarkand)为中心的康国及以布哈拉(Bukhara)为中心的安国最大。此外,还有东曹国、曹国、西曹国、米国、何国、史国、石国等,在不同时期或有分合^[1]。粟特商队开始往来中亚与长安间从事商业活动的最早记载为西汉成帝年间^[2]。公元3至8世纪,众多粟特人在商业利益的诱导下参与到丝绸之路贸易中,并逐渐在沿线定居。这些入华粟特人通过拓展商业

网络、控制中转贸易等方法,在从北朝至隋唐间几乎垄断了丝绸之路贸易^[3]。

中亚地处印度、波斯、中国等文化的汇流之地,民族与文化的多元性也使其成为各种宗教信仰的杂糅之处。通过对考古材料、传世典籍及敦煌文书的研究,目前中外史学界在祆教为粟特人主要信仰这一认识方面已无异议。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粟特商队虽然早在西汉成帝年间便已进入中国,但最早将祆教传入中国的却并非粟特人,而是生活于中亚七河地区(泽拉夫珊河流域以北)的塞种人。林梅村、姜伯勤先生的研究表明,祆教可能早在战国至西汉时期便已随塞种人的迁徙传入了新疆地区^[4]。唐长儒先生籍汉文古籍所做的粟特祆

收稿日期 2009-10-23

作者简介 邵明杰(1982-)男,山东临沂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宗教考古学研究。

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不晚于十六国时期^[5]的论断应为可取。粟特人的商业网络和聚居点遍布西起据史德(今新疆巴楚县)、于阗(今新疆和田县),东到幽州(今北京)、营州(今辽宁朝阳),北到漠北,南到西南边疆的广大地区。粟特人成为中古时代中原地区与北部、西部民族地区乃至中亚、西亚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与此同时,地域特色鲜明的粟特文化艺术也对中原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6]。

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平定后,由于祸首安禄山、史思明等皆为粟特人,汉人产生了普遍的排外情绪^[7]。中原地区形成的排斥胡化、憎恨胡人的社会风潮,影响到了粟特人的生存。他们用改变姓氏、郡望等方法极力抹掉自己的胡人特征^[8]。此后,唐武宗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颁《毁佛寺制》,“显明外国之教”的佛教、摩尼教、祆教信徒皆被勒令还俗。^[9]史籍中从此不见关于中原地区(除河北三镇外)粟特祆教活动的记载。这一历史过程,便是所谓入华粟特人的“汉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甘肃天水石棺床墓^[10]、西安安伽墓^[11]、史君墓^[12]、太原虞弘墓^[13]及宁夏固原南郊粟特人墓地^[14]等一大批粟特人墓葬的发掘,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较为深入,使我们对中原地区粟特人的“汉化”过程有了较为清晰地认识。魏德新先生从姓氏流变入手,对中原地区入华粟特人的另一流向——“伊斯兰化”进行过考证。^[15]范景鹏、米月先生的后续研究对其进行了补充。^[16]这些研究使我们对中原地区粟特人的“伊斯兰化”现象有了轮廓性的认识。

然而,无论是对“汉化”还是“伊斯兰化”的研究,所凭借的材料大多源自中原地区的墓葬、碑刻材料及唐宋间中原文人笔记,其结论带有地区上的适用性。对于丝绸之路重要路段及入华粟特人主要聚居地的河西走廊及新疆地区的粟特人,其流向问题少有人言及,更无系统性论述。在唐宋之际中国北方草原及西域这一时空舞台上,“回鹘”无疑是最为活跃的角色,也是我们思考这一地区粟特人流向的背景。先学们籍古代典籍、考古学材料所做的研究,为我们较为清晰地揭示了7至11世纪北方草原及西域各民族的更替演变过程,为我们今天探讨粟特人的“回鹘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坐标。

在以往的粟特问题研究中,学者们广泛采用以信仰“祆教”作为甄别粟特人的标准,这本是正确的。许多重要的关于粟特人“汉化”及“伊斯兰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亦是在这一“标准”的指导下做出的。但宗教之于民族,往往不能套用单纯的唯一性模式,尤其是对于原居中亚、长期处于城邦制政体下的粟特人而言,宗教信仰的多样性、杂糅性

才是其最突出的特征。祆教,可视为入华粟特人的主要信仰。此外,佛教、摩尼教、景教在入华粟特人中亦有广泛信众。本文通过对回鹘汗国时期,甘州回鹘及西州回鹘时期粟特人在经济、政治及宗教信仰等方面被不断卷入回鹘社会,最终融入到汉族或维吾尔民族共同体这一过程的梳理,就粟特人的“回鹘化”问题聊作引玉之论,不当及错讹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回鹘汗国时期的摩尼教徒

回鹘原称回纥,为铁勒的一支,源于春秋时期的赤狄,汉代称丁零,北魏时称高车。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回纥联合薛延陀击败突厥,开始崛起。贞观二十年(公元647年),回纥吞并薛延陀,在漠北建立政权,其首领吐迷度“自称可汗”。唐太宗依其所请在其地置“六州七府”。7世纪末8世纪初,摄于突厥强盛,大量回纥部众南迁至河西走廊甘州、凉州一带,唐玄宗遂将“六州七府”扩为“九府十八州”,分别为安北都护府及灵州、夏州都督府管辖。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回纥大都督护输率随从返回漠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护输之子骨力裴罗自立“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唐朝册封其为“怀仁可汗”。天宝四年(公元745年),骨力裴罗灭掉后突厥汗国,建立起东至额尔古纳河,西至阿尔泰山,南抵大漠的“回纥汗国”(公元789年,唐德宗应回纥可汗所请,更“回纥”为“回鹘”)。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调河陇、朔方戍兵到中原平乱,又召回鹘军助剿。安史之乱虽至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平定,但这一事件促成了唐代中后期中原与各民族政权间新格局的形成。吐蕃趁河陇戍兵东调防卫空虚之机,尽得河陇之地,进而又袭取安西四镇,使唐王朝受到来自西部的巨大军事压力;而回鹘又据平乱之功,向唐朝勒索大量绢帛,使得“中国财力屈竭”^[17],给唐王朝造成沉重经济负担。但这一格局却给善于经商,“利所在,无不至”^[18]的粟特人提供了绝好的商机。

吐蕃控制河西走廊及安西四镇后,丝绸之路东段、中段受阻,东西方贸易不得不寻求新的通道。此时崛起的回鹘汗国便成为中西方交通的要冲,“回纥就和中亚粟特商人一起,日夜奔驰于从漠北经北庭都护府、伊犁、碎叶通向河中的草原丝绸大道上”,“创造了草原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19]在这一时期的典籍中,留存了大量粟特人往来于东西方之间、回鹘汗国与中原内地间进行贸易活动的记载。而此时往来于回鹘汗国的粟特人,又多以摩尼教徒的身份出现。

3世纪末,摩尼教受到波斯王瓦拉姆一世的镇压,摩尼本人亦被处决,其信徒纷纷外逃。部分摩

尼教徒逃至泽拉夫珊河流域，使摩尼教在粟特人城邦中获得传播。7世纪末，粟特人将摩尼教传入我国。南宋僧人志磐所著《佛祖统记》记摩尼教始传我国：“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二宗经伪教”即指摩尼教。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唐玄宗诏曰：“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20]先言“伪教”，又言“妄称佛教”，可见摩尼教初入中国是以佛教教派的形态出现的。

前已述及，对于原居中亚，长期处于城邦制政体下的粟特人而言，宗教信仰的多样性、杂糅性是其最突出的特征。独特的地理位置也使其成为各种文化传播的媒介。“在中古时代，由于受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来自‘文化本原’的直接传播不可能起主导作用，‘辗转间接’才是普遍存在的方式。”^[21]中亚本地的传统萨满信仰与由印度传入的佛教、由波斯传入的祆教及摩尼教相互影响渗透，然后再以新的形态传入我国。韩香先生将这种佛教称为“中亚化的佛教”^[22]，同理，经中亚传入我国的祆教及摩尼教亦可称之为“中亚化的祆教”及“中亚化的摩尼教”了。如此看来，初入中国的摩尼教以佛教教派的形态出现就不足为怪了。唐玄宗下诏“禁断”摩尼教后，摩尼教仅在西域胡商中存有信徒。而这一情况，在安史之乱以后发生了变化。回鹘汗国在其中起了主导性的推动作用。

安史之乱平定后，回鹘凭借多次助唐平乱的战功，向唐朝勒索大量绢帛，还以“售马”为名，以瘦马强行换取缣。^[23]《新唐书·食货志》载：“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售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24]

据统计，自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之前，回鹘向唐售马百万匹，换得丝绸约两千多万匹。^[25]“中国为之虚耗”^[26]。过着游牧生活的回鹘人换取数量如此之多的丝绸，转销它地谋取厚利是其动机。因为回鹘汗国不仅控制了东西方贸易的唯一陆上通道——草原丝绸之路，更拥有大批熟悉丝绸贸易的转运商——粟特商队。在丝绸之路东段、中段为吐蕃所阻后，商业利益便成为大量粟特人涌入回鹘地区的原因。从粟特商队的贸易中获利逐渐成为回鹘汗国的经济支柱。这一变化激发了回鹘汗国的巨大变革，掌握汗国经济命脉的粟特商人与以多位达干为代表的当权贵族在政治层面展开斗争。而这场斗争，最终以牟羽可汗的宗教改革见得分晓。

1909年，在外蒙古发现了一合《九姓回鹘可汗碑》，载宝应二年（公元763年）牟羽可汗屯军洛阳期间迎摩尼教“四僧”入回鹘之事：“（牟羽）可汗乃

顿军东都，因观风俗……将睿息（思）等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微三际，况法师妙达明行，精通七部，才高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正教于回鹘。”回鹘同许多游牧民族一样，本信萨满教，摩尼教“四僧”入回鹘后，在回鹘可汗的支持下传播，并逐渐成为回鹘国教。在这场宗教改革中，粟特商人通过拉拢牟羽可汗的方法与达干们就是否推行摩尼教展开斗争。发现于吐鲁番的回鹘文《牟羽可汗入教记》残卷^[27]记载了斗争初期汗国各地不断发生的摩尼教徒及粟特商人被杀事件，“一旦被抓住，就全部杀死，一个活的也不留”。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是牟羽可汗选择了摩尼教，并亲自“劝促全体平民行善”，还“在每十个男子中委任一个头领作为行善和精神活动的监督者”，建立起摩尼教管理体系。对于牟羽可汗改宗摩尼教一事，范文澜先生曾指出：“回纥兴摩尼教，是为了商业上的利益，要九姓胡真心相助。”^[28]林悟殊先生也认为，“由于平乱后依靠粟特人发展与东西方的贸易，商业经济成为国库的重要财源，因而在国家事务和宗教信仰上也就不得不受粟特人的左右。”^[29]或可说，牟羽可汗改宗摩尼教，是粟特商人凭借其经济实力在汗国政治斗争中获得的一次胜利。

学界以往多以信奉祆教作为甄别粟特人的标准，回鹘汗国中大量摩尼教粟特人的出现似乎是历史中的意外。前文已述，泽拉夫珊河流域宗教信仰本就十分复杂，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皆有信仰。况且摩尼教本身便脱胎于祆教，虽然时至今日我们缺乏对摩尼教宗教形态的准确认知，但同为“二元论”宗教，其基本教义当与祆教较为相近。粟特人本身也未必对其详加区分。尤其在回鹘汗国立摩尼教为国教后，出于往来回鹘与唐间行商的需要（当时祆教在唐境仍不允许公开传播），自称摩尼教徒的祆教徒应大有人在。回鹘汗国大量摩尼教粟特人的出现是由独特历史背景所造就的，或可说，这是商业民族的一种应变智慧。

摩尼教国教地位的确立使粟特人在汗国获得了很高的政治权利，以致“可汗常与共国”^[30]。《新唐书·回鹘传》载，公元780年“德宗立，使中人告丧，且修好。时九姓胡劝可汗入塞，可汗欲悉师向塞。”^[31]粟特人鼓动回鹘可汗“入塞”的根本动机，无非是想从唐朝索得更多物品充当货物而已。粟特人在政治上的成功不仅保障了其贸易活动的进行，甚至还使得回鹘汗国成为其牟利的工具。粟特人借回鹘汗国之势，在早已“禁断”摩尼教的唐境建立摩尼寺作为其商业据点。先是大历三年（公元768年）获得唐朝敕许，在长安建立大云光明寺，而后又于唐朝商业中心地区“荆、扬、洪、越等州各置寺一所”。粟特人还籍回鹘与唐朝的修好关系，攫取了许多商业特权。《新唐书·回鹘传》便载：“始回纥至

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资殖产甚厚。”《资治通鉴》也记有:“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以回鹘使臣的身份与唐朝进行入贡贸易也是粟特商人经常扮演的角色。“无论来朝,无论去国,非摩尼不成行,其敬重等于宰相都督,其亲信等于骨肉,其关系可知也。”^[32]而从另一个方面,大量粟特人流入回鹘汗国,也给汗国带来了长期的繁荣。正如唐德宗时将领张光晟奏文中所称:“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耳。”^[33]

粟特人在全面参与回鹘汗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同时,与回鹘人的融合成为一种潜移默化。在五代、宋时的典籍中,回鹘人也成为以善于经商著称的民族^[34],这或可视为向粟特人的一种学习。正如周耀明先生所指出的,“安史之乱后,回纥走上了商业之路,这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可汗为代表的新贵族放弃了游牧业转而从商业,日益趋于封建化和定居生活,从而加强了对有经商传统的粟特人的依赖,进一步密切了他们之间的关系。”^[35]这种融合在文化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回鹘人原使用古突厥文(鄂尔浑—叶尼塞文),9世纪前期,开始使用粟特文,进而又采用粟特字母创制了“回鹘文”。这与摩尼教在回鹘汗国的传播有关,“因宗教活动或传教,粟特语言和文字的影响就更大了,致使最终由摩尼教师用粟特字母拼写回纥语言,经过进一步发展,便创制成了回鹘文字。”^[36]粟特文化对回鹘文化的影响是全方面的,它使得回鹘汗国的文化面貌大为改观。正如《九姓回鹘可汗碑》所言:“薰血异俗,化为茹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助善之国。”^[37]

回鹘汗国的繁荣,是回鹘人与粟特人共同创造的。粟特人在汗国确立其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同时,便开始了“回鹘化”的过程。而粟特文化对回鹘文化的改造,更使得回鹘汗国的国家形态发生了深刻变革——由一个以回鹘部落为主导的部落联盟逐渐演变为统一国家,在此过程中,共同的民族心理与民族认同得以酝酿,“回鹘人”朝着“回鹘民族”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二、甘州回鹘、西州回鹘时期的粟特人

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回鹘在内政混乱又遭天灾的情况下,被统兵将领句录莫贺掘罗勿引10万黠戛斯兵所破。回鹘汗国灭亡后,回鹘部众或南迁或西迁。其中南迁者二十余部三十万人^[38],除十三部重返回鹘故地依附于黠戛斯外,余者皆“由唐朝安置内附,后来融合到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39]南迁同时,庞特勤率部西迁,“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40],并建立起安西回鹘国。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庞特勤死

后,安西回鹘国瓦解,相继形成了甘州回鹘及西州回鹘政权。

(一)甘州回鹘的“汉化”

7世纪初,吐蕃建立起奴隶制中央集权国家,并在征服周边的吐谷浑、党项等族后,不断侵扰河西及陇右州县,进而趁“安史之乱”唐王朝将戍军东调平叛之机,尽占河、陇之地。西迁至甘州地区的回鹘人最初投靠于吐蕃。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张议潮于沙州起事驱逐吐蕃势力后,甘州回鹘又投靠于张议潮。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张议潮死后,归义军势力衰弱,甘州回鹘趁机建立政权并逐步控制了整个河西地区。

郑炳林先生通过对敦煌文书及传世文献进行分析后指出,“晚唐五代河西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除了汉族之外,敦煌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粟特人,瓜州地区是吐谷浑人和吐蕃人,肃州以达怛为主,伊州地区是回鹘和龙家,甘州地区主要是回鹘,凉州地区是吐蕃、嗢末部落。”^[40]以上所举伊州、甘州地区,在庞特勤率部西迁之前即已有大量回鹘人迁入。安西回鹘国的建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整合了河西旧有回鹘。而吐蕃统治者在河西推行的“部落制”,则可能促成了日后甘州回鹘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根据敦煌文书所反映的情况,在敦煌为吐蕃占领之后,吐蕃统治者为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将唐王朝的乡、里制变为吐蕃王朝的部落、将制”,^[41]民众被重新编组居住,出现了敦煌文书P.2991《报恩吉祥窟记》中所称的“呼甲乙而无闻,唤门庭则应诺”的情况。敦煌民众藉此被编为上、下、撩笼、丝绵、行人、僧尼、纥骨萨、悉东萨及中元等多个“部落”。^[42]这一时期甘州地区的“部落”分布情况因缺乏资料尚不清楚,但从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张议潮死后归义军势力衰弱,甘州回鹘趁机建立政权并逐步控制了整个河西地区的情况来看,回鹘当为聚族而居,而且拥有较大的人口基数。

河西地区原本就为丝绸之路要道,粟特人众多。尤其是在敦煌,还存在诸如从化乡之类大型的粟特人聚落。而且,由于长期与汉人通商、通婚等原因,河西地区的粟特人“汉化”程度较深。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粟特人只有极少数沦为寺户,而大部分则散居诸部落,变为部落管辖下的编户……仍然从事着擅长的商业、手工业等。”^[43]相对于吐蕃故地,河西地区无论在文化上还是经济上都占有优势,因而吐蕃在控制河西后,大力推行藏传佛教。河西粟特人所信仰的祆教,回鹘人所信仰的摩尼教、萨满教,以及在吐蕃民间仍有信众的苯教,此时都表现出了“佛教化”的趋势。郑炳林、王尚达先

生曾通过姓氏分析的方法对吐蕃统治下敦煌佛教教团中的粟特人进行研究,认为“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信仰佛教、向寺院施舍财务及修窟造寺,并担任佛教教团中的各级僧官,势力甚大。”^[44]

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张议潮于沙州起事驱逐吐蕃势力,建立了归义军政权。生活于敦煌的粟特人不仅全力支持张议潮,参与归义军政权的组建,还积极参加了张议潮收复河西诸州的战争。^[45]此时的敦煌粟特人,从宗教信仰到生活方式,已基本完成了“汉化”,就连其“赛祆”活动也成了敦煌大众民俗的一部分。^[46]公元848年至1036年间以敦煌为中心存在的归义军政权,以公元914年为界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期由张氏家族掌权,后期由曹氏掌权。荣新江先生通过对比归义军政权前后期在内政和外交等方面的明显差异,建设性地提出了“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乃粟特后裔”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他们(曹氏)早已经被汉文化所同化,从文化而不是种族上来说,与汉人无异。”^[47]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论曹氏是否为粟特人后裔,但在归义军时期敦煌粟特人已基本完成了“汉化”当无疑义。

在张议潮时期,归义军政权一度强盛,相继控制了甘、肃、伊、西、瓜、鄯、河、兰、岷、廓等州。甘州回鹘人亦依附于张议潮,并参与了收复河西诸州的战争。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八月,“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薨,沙州长史曹议金代领军府。制以议金为归义节度使。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鹘陷甘州,自余诸州隶归义者多为羌胡所据。”^[48]以此比定甘州回鹘汗国在公元872年以后不久建立,当与史实相去不远。

“回鹘陷甘州”势必对归义军政权造成沉重打击——甘州以东诸州很快便重新被“羌胡所据”,沙州成为汉人政权控制下的政治孤岛。在此后不久的公元910年,甘州回鹘即兵临城下,沙州百姓上书乞降,与甘州回鹘汗国结为“父子之国”。公元914年至918年间,曹议金更是通过迎娶甘州回鹘可汗之女(回鹘天公主)为妻的方式,确立了与甘州回鹘间的“父子”关系。甘州回鹘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主导河西走廊的历史。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曹元忠死后,归义军政权被甘州回鹘汗国所并。^[49]诸史不约而同地在曹元忠去世不久即将甘州回鹘与沙州归义军并称为“甘、沙州回鹘”。此时,对甘州回鹘的威胁主要来自南部的吐蕃与东部的西夏政权。为此,甘州回鹘同中原地区的五代政权及北宋王朝一直保持着十分频繁的交往,尤其是在宋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甘州回鹘东联宋朝反击西夏,重新夺回凉州,将西夏势力逐出了河西地区。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赵元昊率西夏军采取突袭的策略一举

攻破甘州,继而又控制了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旧地”。甘州回鹘各部再次溃散,分散留居河西者有之,奔西州者亦有之,逐渐淡出史籍。还有部分人退处沙州以南,回复到游牧生活状态。后来,这部分回鹘人被称为“黄头回鹘”(撒里畏吾),逐步发展成今天的裕固族。

前文已述,回鹘汗国在西迁以前便已成为粟特文化与回鹘文化的复合体。西迁甘州的回鹘人虽然在数量上未必成为甘州回鹘的主体,但它却为日后强盛的甘州回鹘汗国提供了政权框架,西迁的回鹘王族成为甘州回鹘的可汗。在甘州回鹘崛起的百余年间,以10世纪中叶为界,前期的仍信奉摩尼教,后期受河西地区汉、吐蕃、党项等族的影响,逐渐改奉佛教。敦煌莫高窟10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回鹘窟即为证据。而且,甘州回鹘所信奉的佛教带有明显的藏传佛教特征。宋人洪皓在其《松漠纪闻》中便记述了当地信仰佛教的情况:“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50]而对于回鹘人的旧有信仰摩尼教,现今人们通过对敦煌出土的《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摩尼教下部赞》等残本研究后发现,这些摩尼教经典里所叙述的仪规和形式不少都撷用了佛教术语、套语,摩尼教尊奉的诸神也都改称为“佛”。^[51]这或可作为回鹘人摩尼教信仰“佛教化”的注脚。

在甘州回鹘为西夏击溃后,除少部分投奔西州回鹘外,大部分部众在留居河西后走上了“汉化”的道路,这或可看作10世纪中叶以后甘州回鹘改奉佛教过程的延续。作为西迁回鹘中的文化阶层——粟特摩尼僧,应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前文已述,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粟特人便已改奉了佛教,并在归义军时期基本完成了“汉化”。西迁甘州的回鹘人(或者说由回鹘与粟特人组成的共同体)其“汉化”进程因甘州回鹘政权的建立,而要较敦煌粟特人为晚。

(二)由西州回鹘到维吾尔

西州回鹘又称高昌回鹘、和州回鹘。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庞特勤即率部西迁。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庞特勤在原唐安西都护府境内(今新疆库车县)称可汗,建立了安西回鹘国。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唐朝册封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庞特勤派仆固部首领仆固俊从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出击,配合归义军攻打吐蕃。仆固俊相继夺取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轮台(今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将吐蕃势力击退至吐鲁番盆地以南。唐懿宗咸通八年(公元867年)张议潮入唐,仆固俊与“代行归义军节度使事”的张淮深关系交恶,遂以西州为中心建立政权。咸通十一年(公元

870年)庞特勤死后,安西回鹘国随之瓦解,西州回鹘政权逐步控制了今新疆东部地区,与河西走廊的甘州回鹘成为并立的回鹘势力。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西州回鹘汗国正式建国。

西州回鹘政权建立以后,在很长时期内仍保持着摩尼教信仰。据11世纪成书的波斯文献《记述的装饰》记载:“九姓乌古斯(回鹘)可汗信迪纳维尔的宗教,在(西州)地方统治者的大门附近,每天都聚集着三四个迪纳维尔教徒,大声念颂摩尼的著作。”^[52]现今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众多用粟特文、回鹘文书写的摩尼教经文,亦可作为回鹘人保持摩尼教信仰的证据。

然而,西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其发达的文化尤以佛教为代表。西州、于阗、焉耆、北庭等地皆为著名的佛教文化中心。5世纪初法显曾描述这一地区:“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53]足见当时佛国景况之盛。

西州回鹘政权建立以后,在当地强烈的佛教文化影响下,回鹘人成为兼信摩尼教与佛教的“双教徒”,使得“摩尼教的经典中有佛教的东西,佛教的经典中也有摩尼教的东西。”^[54]这首先是因为回鹘人通过粟特人所接触的摩尼教本身便带有“妄称佛教”的背景,在汉地的传布中吸纳了诸多佛教因素;其次才是出于回鹘作为游牧民族,本身存在的信仰上的易变性。直至10世纪末西州回鹘汗国建立后,这一情况仍未改变,依旧是“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邀乐于其间。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禳灾。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缄锁甚谨。复有摩尼寺,波斯僧(景教徒)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55]佛教与摩尼教、景教同处一国,只不过佛寺有“五十余区”,信众比摩尼教、景教为多而已。

这一时期的很多文献都提到了回鹘人改奉佛教的情况。在吐鲁番出土的一件据考为公元983年的回鹘文文献便称,“回鹘Tärkän王子曾奉可汗之命,将城内的一座摩尼寺改建为佛寺,明确指示‘剥取拆除摩尼寺内的壁画与塑像,布置装饰佛教内容,改建其为佛教寺院’。”^[56]西州回鹘通过宗教信仰的改变,成功融入到了新疆东部地区浓郁的佛教氛围之中,便于回鹘统治者对该地区实行有效管理,势必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与被征服民族间的融合。除了摩尼教、佛教外,西州地区还流行着景教、伊斯兰教及祆教。回鹘统治者实行了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以适应西州地区作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汇之处,各种宗教思想汇集的特点。

人们曾在吐鲁番地区发现过一些7世纪前后

用粟特文书写的基督教福音书和教论,表明此时景教已传入西州地区。在这其中,粟特人充当了重要的传播人作用。^[57]1246年途经西州的意大利人普兰诺·加宾尼曾说,“畏兀儿人是聂思脱里教派(景教)的基督教徒。”^[58]1253年出访蒙古的法国人鲁不鲁乞也曾说,“在所有畏兀儿人的城市中,都有聂思脱里派教徒和萨拉森人(伊斯兰教徒),前者并散布在朝向波斯方向的萨拉森人的城市中。”^[59]《马可波罗游记》中也说,“哈密居民有三种教派,少数居民奉行聂思脱里教派的教义,信奉基督教;第二种是回教徒(伊斯兰教徒);第三种是佛教徒。”^[60]《宋史·回鹘传》中亦载有西州回鹘景教徒入贡的情况:“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四月,西州回鹘与婆罗门僧永世、波斯外道阿里烟同入贡。”^[61](在这里,“婆罗门”指僧人,“波斯外道”系景教徒。然而,行文中将“西州回鹘”与二者并列,可能暗示此时西州回鹘的官方信仰仍为摩尼教。)

关于伊斯兰教在西州回鹘的传布情况,除上述材料中涉及到的以外,10世纪阿拉伯作家奈丁在其著作《群书类述》中也说,“九姓回鹘的王子——(给呼罗珊王阿布尔·哈森·纳沙尔)带去口信声称:‘在我国的伊斯兰教徒三倍于在你国的摩尼教徒。’并向呼罗珊王发誓说,如果呼罗珊王杀死一个摩尼教徒,他就将把国中的伊斯兰教徒全部杀掉,毁坏所有教堂,同时派人奔赴各国,把其中的伊斯兰教徒实行监视甚至杀之。”^[62]学界目前较为接受10世纪前后伊斯兰教突破阿克苏至库车的“佛教、伊斯兰教分界线”,传入西州回鹘境内的观点。但在蒙古势力控制新疆地区之前,由于信奉佛教的西辽政权的兴起,伊斯兰教东传的势头受阻,在西州回鹘一直未能获得较大发展。

西州地区向来为粟特人的主要迁入地之一,在西州回鹘时期,这里的粟特人在宗教信仰方面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约于公元981年至982年间成书的波斯文史籍《世界境域志》中曾提到西州回鹘境内粟特人的宗教状况:“伯克·特勤诸村,包括五个粟特人的村子。村中住着基督教徒、祆教徒和不信教的人。”^[63]

如前所述,回鹘在西迁以前便已成为粟特文化与回鹘文化的复合体。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西州回鹘政权建立以后,当地众多的粟特人可能较其他民族率先完成了“回鹘化”的转变。公元1154年,阿拉伯人易德里斯在其所著《罗吉尔之书》中曾言及回鹘之大城Tanbie:“此城甚大,有高大城墙围住,有十二扇巨型铁门。临河,河水东流,为当地可汗所居。其地居民信奉拜火教教义。在突厥中,被称作托古斯古斯(回鹘)的民族世代信仰拜火教并崇火。”出现这一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回鹘汗国时期便融入回鹘社会并随回鹘西迁的部分粟特

人此时重新恢复了祆教信仰；二是此时大量的西州旧有粟特人利用其经济优势及与西迁粟特人间的族源关系，首先融入了回鹘上层社会。考虑到当时西州回鹘境内复杂的宗教环境，第二种可能性应该更接近实际情况。而此时如回光返照般出现的祆教，很快便湮没在了佛教的海洋里。小田寿典先生通过对回鹘文佛典《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百余件写、刻本进行研究后认为，该经最初祆教思想非常浓厚，越靠后，修改的地方就越多，而波斯信仰的成分也就被排除得越彻底。^[64]这应是对祆教佛教化的真实反映。

佛教在西州回鹘境内最终被定为国教，并为西迁回鹘人所信仰，与众多粟特译经僧的译经工作不无关系。西州地区自古便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各种文化因素汇集，语言文字状况也十分复杂。汉语、吐火罗语、粟特语、突厥语在西州为不同民族的人所使用。公元981年西州回鹘汗国正式建国后，汗国境内逐渐通用突厥语及回鹘文。也恰在此时，大量佛经被翻译成了回鹘文。敦煌莫高窟及吐鲁番出土的众多回鹘文写经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庞杂的译经工作，自然主要是由以粟特字母创制回鹘文，并十分熟悉佛经的粟特译经僧们来完成的。（粟特人因长期往来各国经商，逐渐成为通晓多国语言的翻译。这点在唐代西域各国朝贡时往往以粟特人为使方面便可见一斑。在魏晋至隋唐时期的佛经汉译工作中，粟特译经僧也做出了重要贡献。^[65]）

大量回鹘文佛经的翻译，使佛教在西州回鹘境内获得广泛传播，也使得掌握回鹘文的回鹘贵族大量皈依佛教。作于公元948年^[66]的回鹘文木杵铭文中就称，“我们二人从那些通晓佛经智慧的师傅们那里听说了如下的话语：‘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建立一座（哪怕只有）一合大小的寺庙，并且在那里安置一尊（哪怕只有）十麦粒那么大的佛陀塑像，并且放入（哪怕只有）七分之一莱籽那么大的舍利，并且建造一座（只有）纺锤那么大的佛塔，那么他就积了最大的公德。……’当我们听说了如此高尚的壮举之后，我们二人就恭恭敬敬地为修建一座寺庙而夯入一根木杵以为基础。”^[67]这是对西州回鹘贵族竞相开窟建塔的写照。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七月二十九日，“（西州）回鹘国可汗遣使来贡方物，且言乞买金字《大般若经》。诏特赐墨字一部。”^[68]可见，信仰佛教在西州回鹘已形成风尚。田卫疆先生曾对柏孜克里克石窟及北庭故城佛教寺庙遗存中西州回鹘时期的王室供养人像及题记进行研究，指出“回鹘王室当时对佛教的信仰程度已经达到很深的境地。”^[69]

公元1132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城（今新疆额敏县）登基称帝，号菊儿汗，正式建立西

辽政权。在此后十年间，西州回鹘国、东喀喇汗王朝、西喀喇汗王朝、花刺子模等国先后臣服于西辽。西辽政权在其统治前期，对归附的国家一律采取保存其原有王朝的政策，只对归附国收取贡赋。各国皆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并继续拥有军队。但其统治后期，因西辽政权强力推行佛教及派驻各属国官员的腐败，西州回鹘及葛逻禄部先后投靠了蒙古。西辽统治者笃信佛教，在雄踞西域的近百年间（西辽于公元1218年为蒙古所灭），契丹贵族每每以武力手段推行佛教。尤其是在西辽末帝屈出律执政时期，更是迫使原东、西喀喇汗王朝境内众多穆斯林皈依佛教，使伊斯兰教的东传势头受到严重打击。这在客观上为西州地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公元1211年，西州回鹘被并入蒙古版图，但仍享有一定的自主权。^[70]自13世纪初至14世纪中叶，佛教在原西州回鹘地区仍作为主要宗教存在。但在蒙古统治者宽松的宗教政策下，伊斯兰教、景教亦有所发展。其后，随着蒙古西征的进行，来自中亚、西亚的大批穆斯林以商人或部队调防的形式进入原西州回鹘地区。

14世纪中叶，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统治东察合台汗国（辖境约为今新疆全境及周边部分地区）的秃黑鲁帖木儿汗于公元1354年正式宣布皈依伊斯兰教，并起经名为艾布·伯克尔·穆罕默德。其后，他以强制手段迫使约16万帐蒙古人及汗国内的回鹘等民族改奉伊斯兰教。直至17世纪末，艾布·伯克尔·穆罕默德及其后继者们都极力推行伊斯兰教，最终确立了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统治地位。西州回鹘及葱岭地区的喀喇汗王朝成为现代维吾尔民族的主要来源。

三、余论

公元870年庞特勤死后，安西回鹘国瓦解。对于此后河西走廊及新疆东部地区出现的甘州回鹘及西州回鹘政权，学界皆认为其为安西回鹘国的继承者。而对于“十五部西奔葛逻禄”的回鹘人的去向，学界多有争论。多数学者认为“西奔葛逻禄”的十五部回鹘人在葱岭及以西地区建立了喀喇汗王朝。^[71]亦有学者认为喀喇汗王朝原为操突厥语的葛逻禄人建立，初至葱岭的回鹘人“经过数十年的修养生息，到十世纪初叶，逐步成为原葛逻禄汗国的实际支配者；而葛逻禄汗国这个名称也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喀喇汗王朝。”^[72]还有学者认为喀喇汗王朝的建立者为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部族。^[73]李树辉先生曾著文对各家观点进行分析，提出了喀喇汗王朝“为乌古斯部族的克尼柯部落于9世纪20年代所建”的新观点。^[74]李先生从揭示8世纪末至9世纪前期葱岭地区的民族分布入手，指出这一时

期活跃于葱岭地区的主要为乌古斯人,并籍对伊斯兰史料的分析,进一步将这一人群确定为乌古斯人部族的克尼柯部落。笔者在仔细对比各家观点所依据的文献、出土文物材料及语源学研究手段后认为,李树辉先生关于喀喇汗王朝“为乌古斯部族的克尼柯部落于9世纪20年代所建”的观点较为可取。故本文在行文过程中,未将喀喇汗王朝作为西迁回鹘部落所建立的政权与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一并论述。“十五部西奔葛逻禄”的回鹘人,应作为一种民族成分,融入到了乌古斯人中。

关于回鹘人的人种归属问题,学界基于现代维吾尔人体质及回鹘人语言归属所做的研究,认为其属于欧罗巴人种。2006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刘宁先生发表《回鹘人种考》一文,首次较为系统地从事体质人类学视角出发,以敦煌莫高窟壁画回鹘供养人像、当代裕固族体质特征、吐鲁番交河故城出土的西州回鹘时期人类颅骨材料及西州回鹘佛寺壁画中的回鹘供养人形象为主要研究材料,指出甘州回鹘及西州回鹘皆“具有蒙古人种的特征”。^[75]目前,通过考古材料及文献记载可知,在汉代以前,现今新疆地区的主要居民为属于欧罗巴人种的塞种人、月氏人及吐火罗人等。至唐代以前,匈奴人、汉人、粟特人、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等相继迁入,新疆地区出现第一次民族大融合。9世纪中叶,大批具有粟特文化特征,操突厥语,属蒙古利亚人种的回鹘人迁入新疆东部地区,并在政治上占有支配地位。经过六七世纪的融合发展,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宗教诸方面逐渐统一。^[76]

在回鹘汗国时期,粟特人以摩尼教徒的身份参与到回鹘人对自身文化的改造过程中,使回鹘汗国在西迁以前便已成为粟特文化与回鹘文化的复合体。这一历史事件,使属于欧罗巴人种的粟特人系统地融入了蒙古利亚人种(回鹘人)之中。回鹘汗国灭亡后,南迁回鹘人大多融入到了汉民族中,而西迁回鹘中的甘州回鹘,在11世纪中叶为西夏击溃后亦大多融入汉族。西迁回鹘中的西州回鹘,在新疆东部地区这一民族大熔炉中经历了长达8个多世纪的民族大融合后,在体质上实现了欧罗巴化,信仰上实现了伊斯兰化。在与葱岭地区的喀喇汗王朝实现了信仰上的拼合后,近代维吾尔族,这一新的民族共同体终于诞生了。

由此,我们可以梳理出入华粟特人流向的完整线索。8世纪末至9世纪上半叶,中原地区汉人因安史之乱产生了排斥胡人的社会风潮,粟特人用改变姓氏、郡望等方法极力抹掉自己的胡人特征,出现了“汉化”现象。与此同时,由于丝绸之路为吐蕃所阻,众多入华粟特人转而以摩尼教徒的身份进入回鹘汗国,并籍草原丝绸之路开展东西方贸

易,开始了“回鹘化”的进程。亦有部分粟特人走上了“伊斯兰化”的道路(日后融入回族)。9世纪中叶,部分“回鹘化”的粟特人在回鹘南迁过程中最终“汉化”。随回鹘人西迁至甘州的粟特人在11世纪中叶因甘州回鹘国的灭亡亦最终“汉化”。随回鹘人西迁至西州的粟特人及西州地区旧有的粟特人,在完成“回鹘化”后最终融入新的民族共同体——维吾尔族。

除了中原地区安史之乱后粟特人的“汉化”外,9世纪中叶及11世纪中叶回鹘汗国及甘州回鹘的“汉化”过程中,也裹杂了众多“回鹘化”了的粟特人。前者可视为是一种“直接汉化”,后者则是一种通过“回鹘化”转而实现的“间接汉化”。而对于最终融于维吾尔族的粟特人而言,“回鹘化”也是其重要阶段。

注释:

霍巍先生曾著文对粟特人在川藏滇地区的一些商业、军事活动迹象进行考证。参见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关于西州回鹘建国时间,学界有大中十年(公元856年)(程溯洛)、咸通元年(公元860年)(巴托尔德)、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钱伯泉)三种观点。本文依《宋史·高昌传》所载,以西州回鹘始称可汗(太平兴国六年)作为其建国时间。

杨富学先生认为Tanbie“疑指高昌或甘州”。参见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该处引文亦转引自《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

参考文献:

- [1][8]荣新江.从撒马尔罕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A]/荣新江,张志清.从撒马尔罕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C].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3,7.
- [2]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祇教在中国的初传[J].西域研究,1996,(4).
- [3]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150~226.
- [4]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祇教在中国的初传[J].西域研究,1996,(4);姜伯勤.中国祇教艺术史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4:9~24.
- [5]唐长儒.魏晋杂胡考[A]/唐长儒.魏晋南北朝史论丛[C].北京:三联书店,1955:416~417.
- [6]姜伯勤.中国祇教艺术史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4:315~328.
- [7]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06~119.
- [9]旧唐书,卷18,武宗纪[M].
- [10]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J].考古,1992,(12).
- [1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1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宝史君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5,(3).
- [1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

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虞弘墓清理简报[J].文物,2001 (1).

[14]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15]魏德新.中国回族姓氏溯源[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

[16]范景鹏.米月.粟特人在中国之新探索——回化研究[A]//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2009年全国博士生论坛论文集[C].兰州大学,2009:207~217.

[17][24]新唐书,卷57,食货志[M].

[18]新唐书,卷238,西域下[M].

[19]苏北海.汉唐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A]//张志尧等.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C].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22~33.

[20]通典,卷40,职官二十二[M].

[21]蔡鸿生.仰望陈寅恪[M].北京:中华书局,2004:77.

[22]韩香.唐代外来宗教与中亚文明[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5).

[23][70]陈佳华,蔡家艺,莫俊卿,杨保隆.宋辽金时期民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315~316,342.

[2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32~235.

[26][33][37]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唐纪四十二[M].

[27][37]冯家昇等.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34~35.

[28]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5.

[29]林悟殊.回鹘奉摩尼教的社会历史根源[A]//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C].北京:中华书局,1987:83~95.

[30][31]新唐书,卷217,回鹘传[M].

[32]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A]//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0:343.

[34]张美华.漠北回鹘的摩尼教信仰[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5).

[35][36]周耀明.从信仰摩尼教看漠北回纥与粟特人的关系[J].西北民族研究,2002 (4).

[37]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369.

[38]李吉和.回鹘的西迁与经济文化整合[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4).

[39]旧唐书,卷195,回纥传[M].

[40]郑炳林.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居民结构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2).

[41]刘进宝.关于吐蕃统治经营河西地区的若干问题[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 (1).

[42]杨富学.国内敦煌民族史研究述要[A]//揣振宇,华祖根.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2年卷)[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43][45]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J].敦煌研究,1996 (4).

[44]郑炳林,王尚达.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J].中国藏学,1996 (4).

[46]赵玉平.唐代敦煌地区“零礼”考述[J].兰台世界,2009 (5).

[47]荣新江.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J].历史研究,2001 (1).

[48]资治通鉴,卷252,唐纪六十八[M].

[49]陆庆夫.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J].敦煌学辑刊,1998 (1).

[50]洪皓.松漠纪闻[M].沈阳:辽沈书社,1985:20.

[51][69]田卫疆.试析高昌回鹘内部的三次宗教传入及其后果[J].西北民族研究,2003 (1).

[52]田卫疆.高昌回鹘史稿[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167.

[53]法显.法显传校注[M].章巽,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3.

[54]余太行.西域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258.

[55][61][68]宋史,卷490,高昌传[M].

[56][62]杨富学.关于回鹘摩尼教史的几个问题[J].世界宗教研究,2007 (1).

[57]羽田亨.西域文化史[M].耿世民,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61.

[58]普兰诺·加宾尼.蒙古史[A]//道森编.出使蒙古记[C].吕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1.

[59]鲁不鲁乞.鲁不鲁乞东游记[A]//道森编.出使蒙古记[C].吕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55.

[60]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M].陈开俊,等译.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43.

[63]王治来.世界域志[M].周锡娟,译.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1986:65.

[64]小田寿典.トルコ語本八陽經寫本の系譜と宗教思想の問題[J].东方学(第55辑),1978:118~104.

[65]张广达.粟特人在佛经翻译中的作用[A]//张广达.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90~294.

[66]哈密屯.五代回鹘史料[M].耿昇,中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152.

[67]杨富学.回鹘之佛教[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190.

[71]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27~32,73;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的研究[M].宋肃瀛,刘美崧,徐伯夫,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72]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141.

[73]王治来.中亚史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350.

[74]李树辉.喀喇汗王朝的建立者及建立时间[J].西域研究,2004 (4).

[75]刘宁.回鹘人种考[J].边疆考古研究,2006 (4).

[76]苗普生.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维吾尔族的形成与发展[J].西域研究,2005 (4).

[责任编辑 张 科]

[责任校对 张 科]